

# 求新之路<sup>\*</sup>

## ——《中国经济史研究》31年历程浅析

赵德馨 杨祖义

作为忠实的读者与投稿人,我们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以求新为追求目标的艰辛探索的31年历程印象深刻。下面是我们的一些读后感。

### 一、追求“四新”,办刊宗旨明确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其《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们希望本刊发表的著作,或者是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是阐述了新的观点,或者是运用了新的方法,或者是发掘了新的资料,当然都应当具有一定的史实根据和理论深度”。<sup>①</sup>《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办刊实践中始终坚持“四新”目标,倡导学界形成严谨的学风。现就《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推动学界“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发掘新资料”三方面的努力与贡献,予以举例说明。关于推动经济史学界“运用新方法”的努力,则在下文中专门论述。

第一,提出新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刊文章,都提出了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新问题。有的是关于研究方法层面的探讨,有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国情问题,有的是需要结合经济学进一步分析的理论范式,它们大都属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主线问题,土地改革后两极分化问题,1949年以后的通货膨胀问题和剪刀差问题;20世纪90年代关于人均国民收入差距问题;新世纪以来关于历史上各个时期GDP核算等问题,都先于其他学术期刊。在当时,这些问题既新颖,又尖锐,引起学界热烈的讨论。这既体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勇气,又突显了它引领学科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经济史研究》不仅通过所刊文章提出新问题,还通过以下两种形式组织对新问题的讨论,深化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

(1)就新问题组织笔谈。如何把握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不但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体认识,而且事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情的认识,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989年第3期组织了13篇文章深入探讨“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类似的笔谈还有1989年第4期组织了3篇文章论析“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本质”;1996年第1期组织了15篇文章讨论专业刊物“如何为经济实践服务,如何办出理论特色”;2003年第1、2、3期组织了12篇关于“传统经济的评价”的文章——虽然传统经济的评价是个老问题,但《中国经济史研究》提出了“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经济究竟是不断发展,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这个讨论的新角度。

(2)就新问题组织专题学术研讨会。自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选择一些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新问题,召开一系列小型专题研讨会。1997年起,将这种会议称之为“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的特点,一是议题新,如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等;二是参加者是对议题感兴趣、有研究的人;三是规模小,会前准备比较充分,会间非常认真和投入,讨论的学术含量比较高。自2002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

[作者简介] 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武汉,430073。杨祖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武汉,430073。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家群体与学科理论演进的历史考察”(批准号:13BJL01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批准号:15AZD015)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发刊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部在“国学网”特别设置“经济史论坛”栏目。这个“论坛”是经济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园地，它是开放性的，讨论式的。“论坛”起到了拓展与深化学科研究领域、发掘学科增长点的积极作用。

第二，阐述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不刊发没有新观点的文章。新观点包括对具体史实的新结论，从具体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新观点和新的理论范畴。新观点最易引起争论。《中国经济史研究》自觉成为讨论新观点的平台。它在《发刊词》提出，“欢迎大家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率直的讨论，对学术著作进行认真的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通过开办“论著评介”“问题讨论”“读者·作者·编者”“学术争鸣”“争鸣”等专栏，发表商榷类论文多篇，<sup>①</sup>体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对阐述新观点的鼓励与包容。严中平与汪敬虞两位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通讯》，是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之间的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学术对话。曹幸穗和姚洋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围绕《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一文展开的对话，是中年学者之间进行的学术批评与答辩。杨勇和马俊亚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围绕理论分析基本范式相互间进行学术质疑与批判，是青年才俊之间的学术讨论。以上三例是老中青三代人真诚对待学术新观点的真实写照。正如曹幸穗在《学术呼唤批评》一文中指出，“我与姚洋同志素昧平生，今天的纸笔之交全凭藉志同道合的学术缘分。”“这篇书评中所洋溢的直率和坦诚，所体现的学术至上的精神，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凝重。”<sup>②</sup>《中国经济史研究》鼓励发表新观点，在争鸣中淡化政治色彩，拒绝人身攻击，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也不迷信权威，回归学术命题，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史学史上的几次学术争论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三，发掘新资料。长期以来，资料的缺乏制约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并把它作为重要的学术评价标准。例如，1986年第4期刊发的章有义《徽州江姓〈新置田产各据正簿〉辑要》，正如文中所述：“本簿不同于一般常见的置产簿，它不仅包括各号田地的买卖契据，而且记录了所有其他有关文契和批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徽州土地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地产转移方式、地权形态和租佃制度”。<sup>③</sup>1987年第1期刊发的谢重光的《鞠氏高昌寺院经济试探》一文，以吐鲁番墓葬文书中发掘的资料为主，结合传世文献和金石资料中的有关记载，对鞠氏高昌寺院经济作初步探讨，做到了史实根据和理论分析的深度结合。1987年第2期刊载章有义的《近代徽州租佃关系的一个案例研究——歙县汪光裕会租簿剖析》，依据的是汪光裕会租簿，为考察徽州地区租佃关系提供了新史料。1987年第4期刊发的每一篇论文，几乎都有新发掘的资料作为分析的史实根据。<sup>④</sup>鼓励发现和使用新资料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特色之一。

<sup>①</sup> 韩志宇：《也谈对“平分土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清庆瑞、黄文真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史志宏：《关于“清代经济运作特点”的思考——与陈春声刘志伟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愈凯：《恢复时期我国外贸政策未曾出现“大进大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孙玉琴：《关于明代“倭寇”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与唐力行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刘秋根：《关于汉代高利贷的几个问题——与秦晖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陈尚胜：《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李华瑞：《关于宋代酒课的几个问题——与杨师群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杨师群：《宋代酒课几个问题的再商榷——答李华瑞同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李裕民：《〈宋代经济史〉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姜锡东、李华瑞、游彪：《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1997年第1期；彭厚文：《旧中国证券市场若干问题的订正与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刘克祥：《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驳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经君健：《关于明清法典中“雇工人”律例的一些问题（上）——答罗伦先生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杜恂诚：《“黄宗羲定律”是否能够成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田宅典当契约探析——兼与郑力民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等等。

<sup>②</sup> 曹幸穗：《学术呼唤批评——兼答姚洋对〈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的批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sup>③</sup> 章有义：《徽州江姓〈新置田产各据正簿〉辑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sup>④</sup> 如卜国群的《试析明代苏松地区的田赋量》、彭泽益的《清前期农副纺织手工业》、樊树志的《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张国辉的《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朱勇的《论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经济职能》、汪敬虞的《立德和川江的开放》、林金枝的《论近代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及其作用》、彭家礼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劳动力外流和“猪仔”贩卖的高潮》等文。

## 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创新的指导思想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发刊词》中宣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刊物”。“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间的辩证关系以观察历史；又要求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实事求是”。“本刊将要发表通过历史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互相作用的具体发展过程的分析，探索中国社会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sup>①</sup>

经济史学的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已被中国经济史学史的实践所证实。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部分学者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历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的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纷纷问世，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中国经济史学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学界“五朵金花”<sup>②</sup>的学术大讨论，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涉及经济史命题。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们纷纷浸淫于五朵金花及其相关命题的研究，这就不能不使得这些命题的研究深度，得到空前的发掘，从而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一个显著特色，尤其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农村社会经济史、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为后人的学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sup>③</sup>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史学迎来了“文革”前十七年的转型与初步繁荣。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实践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史学健康发展。从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历史考察，马克思主义成为经济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地形成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是对中国经济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

《中国经济史研究》刊发的文章，大都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范畴。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的探讨。在论述上，大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使用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话语。通过史实的研究和叙述，揭示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和作为其实现形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史学界打破了很多禁区，一些学者开始引进西方的经济史理论与研究方法。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内社会科学僵化封闭的研究环境，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困扰，同时也出现淡化，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苗头。《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场遇到了挑战。如何正确对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经济史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赵德馨在 1987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一书中提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多个层次，“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高层次，便可以大胆地借鉴外国社会科学家使用的通用方法和具体方法，对它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和改造，把它们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系统之中，使我们的研究方法成为开放型的、不断发展的、最为丰富也最先进的研究方法”。<sup>④</sup> 他的这种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借鉴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具体研究方法关系的主张，得到了时任《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金玉研究员的赞赏。1988 年 8 月，在中山大学纪念梁方仲诞辰八十周年学术讨论期间，他们就这个问题当面深入地交换过意见。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发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经济史研究》评论员文章，及时地阐述自己的主张：“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永

<sup>①</sup> 《发刊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sup>②</sup> 20 世纪 50 年代，学界围绕“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农民战争”等问题展开学术大讨论。

<sup>③</sup> 陈争平：《20 世纪历史学的三大情节》，《厦门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sup>④</sup> 赵德馨、周秀鸾：《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2 页。

远前进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经济史研究中,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介绍和学习外国经济史方法和理论方面,现在不是开放得过头,而是开放得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前进,而不是后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经济理论的传进,不但活跃了我们的思想,也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条件和契机。因为其中一切有科学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丰富我们的研究,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养料。”<sup>①</sup>。此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继续刊载大量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色的研究成果。如:1990年第1期吴太昌的《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一文,从理论分析范式到具体术语运用都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色;1991年第3期戴银秀的《1952—1984年中国农业领域个人收入分配方式的历史变革》一文,则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按劳分配理论;1991年第4期龚建文的《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一文,不仅运用了马克思理论分析范式,而且在资本估值、产业资本估值、工农业总产值估计、交通运输业总产值估计等国民经济指标的统计分析中大量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术语或范畴;1994年第2期苏少之与赵德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地位》一文,从“新的政治经济学”和“独特社会发展阶段论”两方面论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1997年第3期侯建新的《明清农业雇佣经济为何难以发展——兼与英国封建晚期农业雇佣劳动比较》一文,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农场、雇佣劳动等范式分析了中英农业雇佣劳动不同的发展前景,对当时中国正在改革中的农业生产组织也具有启示意义;2008年第1期李方祥的《“五反”运动后国家对劳资关系调整的经济史分析》一文,从历史视角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劳资关系寻找经验与理论。除了这些论文之外,从1991年至今,吴承明、李文治、汪敬虞、方行、魏金玉、经君健、江太新、李根蟠、董志凯、汪海波等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文章,都旗帜鲜明地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学术立场。

### 三、紧跟时代步伐,鼓励使用新方法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积极介绍国外经济史学界有关方法论层面的最新进展与理论成果,在引进新方法、运用新理论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在研究方法层面。1989年,段宾在《新中国经济史的宏观数量分析》一文中,试图建立一个关于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数量模型,以已有的历年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新中国30多年来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及其特征建立数量模型进行分析。该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者发表的第一篇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分析共和国经济的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难免略显稚嫩,但《中国经济史研究》还是在第3期予以刊发。1992年第2期瞿宁武的《计量经济史评介》一文,对计量经济史学的缘起、发展、过程及内容、理论基础等方面作了简要介绍,并对国内经济史学界如何消化吸收作了积极探索与思考。此后,《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办了“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研究笔谈”与“计量经济史研究”两个专栏,发表计量经济史论文27篇。其中,有对计量经济史相关理论的评介,也有对估算中国历史上GDP方法的反思;有对中国近代经济长时段的考察,也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宏观经济的数量分析;有对货币与金融问题的专题研究,也有微观的个案考察。通过创建计量经济史专栏,评介计量经济史理论,刊发相关的专题论文等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对学界引进与运用计量史学理论与方法有促进之功。2000年第3期刘佛丁的《齐波拉经济史学思想述评》一文,则推动了中外经济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交流。2002年第3期韩毅的《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一文,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做了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并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些新方法、新理论的介绍和引进,成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养料。

<sup>①</sup>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在理论范式层面。1988 年第 2 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登载罗伦的《关于清代以来冀—鲁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演变形式问题——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作者黄宗智教授[美国]商榷》。1991 年第 3 期登载黄宗智的《略论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以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为例》。1993 年第 1 期登载千里的《“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1994 年第 1 期登载《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简述》。2003 年第 2 期登载张家炎的《如何理解 18 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这些论文探讨的焦点问题是,“前近代东西方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这是他们所共关注的问题”。<sup>①</sup> 无论是早期工业化理论、还是“过密型增长”理论,都是学界试图运用“非资本主义萌芽”范式的努力与尝试,这些术语或范式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萌芽论者都有共通之处。通过这些争论,《中国经济史研究》逐渐成为不同经济史学研究理论范式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平台。《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敞开了包容学界新理论与新方法的胸怀。

#### 四、帮助新学科的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现代经济史学(1949 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逐渐兴起。20 世纪 50—60 年代,有一些政府部门和学者从总结工作的角度,对国民经济恢复、三大改造等进行专题研究;有的高校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开始将新中国经济史纳入经济史课程之内。1959 年,中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下限讲到 1956 年。随后,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被视为学术“禁区”。1988 年 2 月 18 日,《人民日报》登载史存信《现代史难于宇宙史》一文,形象描述了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环境与困难:“距离(今)越近越难,倒是远些的好办,所以民国史已问世,而当代史未刊行。既然古代史比近现代史显得容易些,宇宙史当然更显得比人间史容易些了。”<sup>②</sup> 那时的情况是:“中国当代的事,中国人研究不得,只能由外国人去评说!”<sup>③</sup> 在 1986 年之前,国内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不登载中国现代经济史文章。更没有一家带“史”字的学术期刊,如 1954 年创刊的《历史研究》,1982 年创刊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刊发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相关的论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创刊之时起,不仅登载现代经济史论文,而且将它与古代、近代并列。1986 年第 4 期梁秀峰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上的探索和实践》刊发,鼓舞了广大现代经济史学工作者的科研热情。为了使现代经济史学研究成果能够在同行中得以及时交流和分享,1989 年第 3 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了“当代经济史研究”专栏,正式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办刊格局,改善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分析,1986 年至 2016 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共刊载中国现代经济史论文 270 多篇。从时间来看,涉及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大跃进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三线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等历史阶段;从领域来看,涉及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经济体制改革、三农问题、生态与环境、土地制度、工业经济、财政金融、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对外贸易、人民生活等国民经济各个主要领域。这对于推动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成长贡献甚大。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迅速兴起和发展,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帮助密不可分。

#### 五、继承传统,培育新人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的当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 108 人,

<sup>①</sup> 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8 页。

<sup>②</sup> 转引自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后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47 页。

<sup>③</sup>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第 846 页。

都是经济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的《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全文刊发。此后,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骨干力量活跃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个阵地上。《中国经济史研究》团结了全国各地广大经济史学工作者。

《中国经济史研究》注重传承中国经济史学界前辈学术思想。在这门学科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三代中国经济史学家群体。第一代经济史学家群体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第二代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代学术新人。第三代为改革开放浪潮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队伍。《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方面总结第一、二代人的经验与学风,使之成为学统,同时着力培育20世纪80年代之后崭露头角的新人。

在总结本专业学统方面,1989年第1期开设“纪念梁方仲教授专辑”,刊载了李文治、罗尔纲、彭雨新、刘志伟、陈支平等纪念梁方仲教授八十诞辰学术讨论会论文。1992年第2期,开设“纪念严中平同志逝世一周年专辑”。2012年第2期,开设“纪念吴承明先生逝世一周年专辑”。2013年第4期,开设“纪念汪敬虞先生逝世一周年专辑”。从1999年第1期开始,创办“学人与学术”“学人论学”“经济史名家”等专栏,先后刊载了《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思考》《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50年漫谈——张仲礼自述》《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访汪敬虞教授》《漆侠教授谈宋代经济史研究——漆侠教授访谈录》《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百年回眸——李根蟠先生访谈记》《谈梁方仲教授的治学道路》《吕振羽对中国经济史的开拓性贡献》《全汉升与中国经济史研究》《怀念学者刘潇然——写在刘潇然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试论陈翰笙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思想与方法》《求通——访问赵德馨先生》《梁方仲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方行先生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文章。这些专辑与专文,形成了自觉传承学界前辈学术思想的良好学风。

一代又一代学术新人的培养和成长,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源动力。刊物联系四方,吸引了各色人物投来各种稿件,最容易从中发现人才。把那些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或者暂时稍有些欠缺,但扶一扶就能起来的中青年学者,通过刊发其文章等方式,推荐、选拔出来,让他们显露光芒。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明确宣示,“帮助和培养青年学者,是本刊的神圣职责,我们要不遗余力地为青年学者服务,为使经济史学界后继有人做出应有的贡献”。<sup>①</sup>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与现代经济史学队伍的成长互动,是具有说服力的例证。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分支学科,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尤为迫切。《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发表现代经济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使得现代经济史学研究队伍中一大批年轻人脱颖而出。2012年9月20日,中国经济史学会选出第六届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共31人,其中有19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了有关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专题论文。排名前三的董志凯、武力、苏少之、赵凌云(苏少之和赵凌云并列第三)先后被选为主任、副主任,成长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董志凯在1987年第3期就发表了《土地改革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回答对我国土改的一种看法》,武力早在1991年第4期就发表了《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宏观计划管理》,苏少之在1989年第3期就发表了《论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两极分化》,赵凌云在1992年第3期就发表了《1957—1988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后两篇主要内容为其硕士学位论文。发表论文数量排在第五、六位的赵学军和常明,也已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从2000年第4期开始,《中国经济史研究》专门开设了“青年论坛”专栏,特别注重青年中的博士生。2004年第1期辛维举的《政府干预经济对我国建国初期制度变迁的作用》,2007年第4期常远的《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背景分析》,2010年第1期林柏的《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与设备历史考察》,2010年第3期邢新春的《建国以来我国铁路建设的区域布局和空间演进特点分析》,2011年第2

<sup>①</sup> 魏明孔:《主编寄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期孙建红的《宁波民营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考察》,2011 年第 4 期刁莉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及其经济社会影响》,2012 年第 1 期宋承国的《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特点与评价》,2012 年第 4 期王银飞的《乡镇企业的“一九八四”: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小五金业研究》等中国现代经济史学论文,作者都是博士生。2011 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设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工作报告论文摘要,鼓励青年学子。“青年论坛”与论文摘要的开设,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培育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新生力量又一重大举措。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兴起大学与学科排名之风,不少学术刊物片面追求影响因子等社会影响力评价指标,忽略了对学人发现与培养的责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却以团结培养学人为己任,积极尝试“种米下锅”,<sup>①</sup>以杂志为平台努力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2014 年 10 月,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的努力与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协作合办“首届中国经济史博士后论坛”。论坛将入选论文分作现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及古代经济史三个单元进行讨论,每个单元在博士后报告论文后,均安排与会专家进行点评,新老专家交流互动,青年学者与知名学者互动,对于提高青年学者的研究能力,大有裨益。此后,一年一度的论坛成为齐集经济史学界青年学者的重要平台。这是一件极有长远意义的大事。

## 六、希望扩大新领域

学术领域的求新是无止境的。在求新之路上,《中国经济史研究》仍有广大的空间等待扩展。扩展空间,首先与对经济史学内涵的理解有关。经济史学的对象决定了这门学科的内涵是极为广阔的。从学科研究对象区分,经济史学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经济史学(习惯上简称为“经济史”)这个大类中又可区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以研究经济生活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它是怎样演变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因素。另一类是在前一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进行理论的抽象,着重揭示演变的运行机制与规律。<sup>②</sup>

关于经济史学科的对象,过去有过讨论。在范围上,限于经济史学。对经济史学的对象,又限于生产关系,或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统一。实际上,经济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演进的过程、运行机制及其规律。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生活包括生产和生活两个侧面。只有既研究生产,又研究经济生活,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生活风气的发展,经济史才是生动的、丰富的。人们读经济史著作,从中得到的如果只是生产关系、生产力状况的知识,却不知道经济生活是怎样的,不知道人们吃穿住行的状况与变化,就难免感到不满足。从再生产的过程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也是缺一不可的。生产决定消费,生产的目的本是为了生活。生产决定生活,生活又反过来影响生产。<sup>③</sup> 我们期待着,对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以及经济史学科的内涵作深入的探讨,期待着更多反映普通民众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成果走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视野。

经济史学概论是经济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包括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功能、理论、方法、体裁、历史等等。过去,欧美等国经济史学的专业期刊非常注重经济史是什么、经济史学的功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等有关经济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这推动了经济学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相关专业期刊,如《食货》,也注重对经济史学概论内容的研究,他们有的是翻译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的是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史研究》能

<sup>①</sup> 魏明孔:《浅论学术期刊编辑中的“五米”》,《澳门理工学报》2017 年第 2 期。在该文中,作者论述了期刊编辑中的“五米”(等米、找米、种米、筛米、晒米)问题。

<sup>②</sup>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8 页。

<sup>③</sup>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第 31 页。

够传承国内外经济史学期刊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加强对什么是经济史学，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等问题的探讨，引导学界重视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这将对学科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济史学的任务，一是要弄清楚与经济生活演变过程有关的事实，二是要从这些事实中抽象出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历史学理论、哲学理论（经济史观）、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地理学（经济地理）理论等等。弄清经济史实是抽象理论的基础，理应受到重视，但如果停留在这一步，不能为理论作出贡献，给理论界的朋友提供新的东西，那么受到他们的忽视，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谈史实的多，说理论的少，是经济史学界的软肋。我们期待着，理论色彩更加浓厚的经济史研究成果走进《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够引起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学人的广泛关注，能够为创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养分。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责任编辑：黄英伟）

## 杜希德《唐代财政》译介

《唐代财政》原本是杜希德的博士论文，经整理后出版并再版。该书梳理并再现了唐代财政 300 年间的剧烈变化，揭示了其对后来社会的诸多影响，是中国中古时期财政史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中文译本由中西书局于 2016 年出版。

首章“土地分配制度”，在简述制度之后，作者运用敦煌、吐鲁番资料证明，在 769 年之前，均田制在西北边地一直合法地实施，进而反驳了“均田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的观点。均田制之所以瓦解，是由于法令方面存在缺陷，且地方官本应是执法者，恰恰同时也是违法者。由于土地集中，引发逃户问题，宇文融最终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安史之乱后，大土地私有状况进一步蔓延至社会各个层面，“庄园”普遍出现。

第二章“直接税务”，讲述租庸调制的基本情况，并指出这是一种不尽如人意的制度。相比之下，户税由于以资产估算为基础，反而是一种进步税制。地税也是如此。两税法改革，使得一个道的赋税收入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它承认节度使有权支配本道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同时也保证中央政府可以从各道获得一个固定的收入。

第三章“国家垄断与商税”，讨论榷盐、榷酒、茶税问题，其实就是间接税。榷税的诱人之处在于，只要控制生产地，就可以确保稳定的财政收入。在这方面，唯有榷盐取得了成功，而榷酒与茶税都在财政收入当中所占比重甚小，且引发管理混乱。

第四章“货币与信贷”，述及官铸钱存在管理松散与不注意铸造方法的缺陷，因而引发恶钱问题。唐朝一直存在钱币短缺的问题，原因是政府不能铸造足够多的钱币，而铸钱量过少的原因之一，则是金属严重短缺。因此，布和贵金属也兼为货币，同时发展出飞钱、柜坊、金银铺等信贷组织。

第五章“漕运与交通”，主要讲不同时期的漕运改革，与榷盐部分略有重合。其中前期的重点，是裴耀卿的节级转运，以及韦坚等人的后续改革。在后期，涉及汉水线的启用，以及刘晏的恢复漕运。

第六章“财务行政”，分三个阶段论述唐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系统。第一阶段仍在原有的台省寺监体系内运行。第二阶段一大批财政专家通过使职，攫取了极大的权力，从而协调整个领域的工作。安史乱后，中央为筹措资金，盐铁使获得极大发展。两税法改革之后，度支司日益权重，形成户部、盐铁、度支“三司”。地方上，道一级政府在京师到各县的管辖序列中，充当了中间环节。从中央到各道都有了权力下放。（丁俊）